

◎ 吴宝科 佟新 编

袁方
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宝科 佟新 编

袁方纪念文集

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严复是清末要求变化维新寻求救亡图存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光绪五年他在天津直报开始介绍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译为“群学”。一九〇三年他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出版，书名为“群学肄言”。群学一词取意于荀子《王制篇》，所谓群学就是用科学的法则来研究人類社会的历史发展，以预测未来。所谓群言就是究其功用之所施，提出所以治之者。当时维新派学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都重视和引进社会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方纪念文集/吴宝科, 佟新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301-08394-7

I . 袁… II . ①吴… ②佟… III . 袁方(1918~2000) – 纪念文集
IV . K825.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577 号

书 名: 袁方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 吴宝科 佟 新 编

责任编辑: 陈宏 李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394-7/C·03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这张照片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 1942 年级毕业时师生的合影。老师们坐在第一排，由左起分别为：李景汉、潘光旦、陈达、陈序经、吴泽霖。同学：第一排右一是邝文宝，右二是周颜玉；第二排左起为袁方、梁树权、××、游凌霄、孙观华、胡庆钧；后排右起张萃群、游补钧、张正东、黎宗献和 ×××。

西南联大于 1938 年 11 月 1 日开学后，紧张投入学习，同时开展了各种宣传团结的政治、文艺活动。社会学系同学人数虽少，但也开展了各种活动。部分同学办起了墙报《社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办有学习讨论会、辩论会等，气氛活跃，许多外系同学也来参加，在校内有一定的影响。（孙观华文，张正东提供照片）



1990年袁方先生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师在一起。



1993年11月6日袁方先生和金耀基先生在一起。



1995年袁方在自己的书房

劳动问题 目录

1998年

- 一 緒論
- 二 劳动科学理论、方法和体系
- 三 劳动关系
- 四 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
- 五 劳动力市场
- 六 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
- 七 工资理论和工资问题
- 八 工作时间和间歇时间
- 九 生活费
- 十 劳动争议
- 十一 社会保障
- 十二 劳动法和工会法

社会学系 人口与劳动组

袁方先生手迹

目 录

第一辑 袁方文选

评潘光旦的《自由之路》	(3)
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	(5)
城乡关系:敌乎? 友乎?	(10)
论手艺人改行	(15)
我国劳动就业问题	(37)
大力开展城市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	(53)
城市社会问题和城市社会学	(57)
新生的社会学系在茁壮成长	(68)
北京市人口发展的控制问题	(70)
中国老年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82)
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	(94)
老年社会学	(105)
社会工作教育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10)
中国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改革	(122)
在纪念陈达教授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29)
高校的社会学现状与发展	(135)
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	(136)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转变	(143)
继续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149)
人口、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151)
学习《江村经济》的一些体会	(159)

第二辑 报刊记者访谈录

勤奋于书斋与社会之间

- 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袁方 李冀元 马丽(169)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眼中的社会
——袁方：大千世界看方圆 孙惠莲(172)

第三辑 论文及袁方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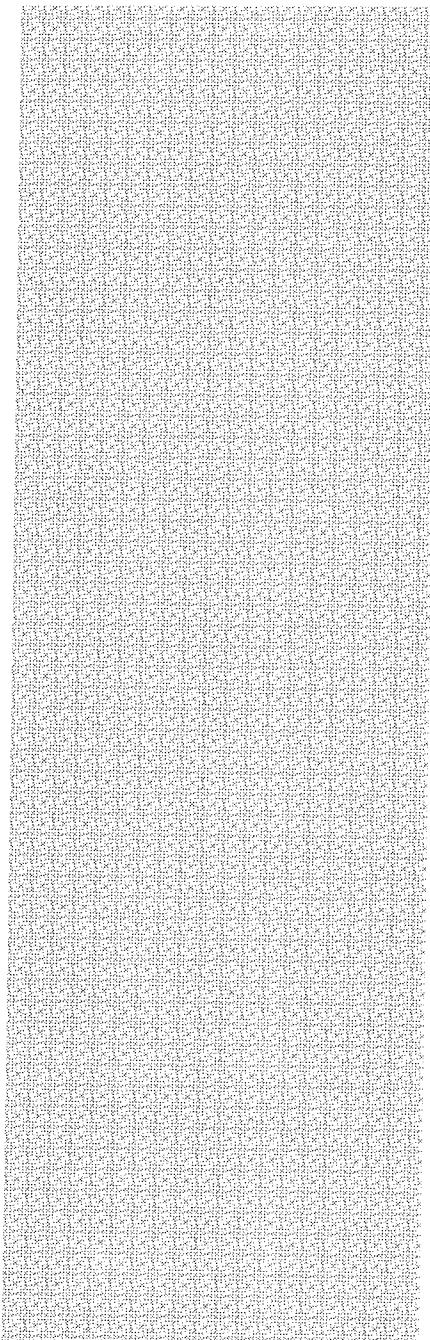
- 爱与知识同在：纪念袁方教授 (179)
无私奉献 时代楷模 王思斌(182)
袁方生平(1918—2000) (185)

第四辑 缅怀文选

- 1957年秋的不平遭遇 胡庆钧(193)
为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献身 韩明謨(199)
怀念袁方教授 金耀基(203)
我所认识的袁老 林楠(205)
回顾北大社会学学科重建简要经过 潘乃穆(207)
袁方与社会学 华青(217)
袁方先生逝世周年追思 潘乃穆 潘乃谷(221)
学习袁方先生的办学精神
——悼念先生逝世一周年 郭崇德(225)
不朽的丰碑，永恒的纪念
——写在袁方教授逝世一周年 刘庆唐(228)
悼念敬爱的袁方老师 蔡博生(232)
袁方先生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刘伟能(234)
袁方先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奠基性贡献 王思斌(237)
深切怀念袁方先生 吴宝科(240)
缅怀袁方教授 马戎(242)

忆与袁方先生交往的二、三事	夏学銮	(244)
袁方教授和社会学系的对外合作和交流	杨善华	(247)
怀念袁方先生	谢立中	(250)
怀念我的导师袁方先生	程为敏	(253)
袁方先生对劳动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佟 新	(255)
袁先生把我领进社会学的大门	佟 新	(258)
谆谆教诲 无私奉献		
——深切缅怀导师袁方先生		
.....陈宇 魏进 焦凯平 李怀康 宋晓梧		(261)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忆袁方老师	刘金云 王晏	(265)
儒者风范 师德楷模		
——忆我的第一位学术导师袁方先生	董克用	(267)
为人师表 学界楷模		
——忆袁方教授	杨兆清	(269)
生前育人,多少俊才竞折腰/身后立人,无数后生踊相随		
——缅怀袁方教授	马子密	(273)
追思	陈颖	(276)
悼念袁方先生	李冬莉	(279)
袁方教授纪念基金		(281)
后记		(283)

第一辑 袁方文选



评潘光旦的《自由之路》^①

近数年以来，民主自由的呼声，真是甚嚣尘上。民主自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可是若一分析大家谈的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内容，右派有右派的论调，左派有左派的主张，“第三方面”的说法又不同了，百家争鸣，当然更可以衬托出真理的本来面目。各不相同，从民主自由的立场上说，自然是再好没有的现象。

可是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似乎树立不起真正自由的空气，谈自由民主的人，往往是最不自由民主的人。因为有些人总把自己的货色，认为是天下惟一的真理，十全十美，没有虚心讨论的态度，没有宽容异己的雅量，没有清风明月的胸襟，唇枪舌剑，面红耳赤，非要做到你败我胜，“你死我活”，天下定于同一的局面不可。这样的结果，自由似乎成了江湖术士的辞令，“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了。

正因为这种江湖术士太多，“宣传重于教育”的恶劣现实中，潘光旦教授所著《自由之路》实在可以纠正多少人盲目的态度，可以解放役于宣传下的心理，可以澄清舆论界的混乱。

一般人谈自由也许从政府立场，也许从经济立场，当然也有人从党的立场把自由似乎分析得一干二净。誉之者有之，毁之者亦有之。可是从生活、处世、做人的观点去对自由作一解释的《自由之路》一书的作者，也许要算是开风气之先。

自由是什么？著者基本的肯定：“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这个看法显然出自人本主义。自由既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没有自由，当然没有生命。换言之，就是要把人当人看待，奴己奴人，刍狗人生，都不是自由，都不是通达到自由的境界！

一个真正懂得自由的人，心地是光明正大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对

^① 本文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期，1947年10月16日。标题为编者所加。《自由之路》由潘光旦著，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五年8月出版。

己对人可以心所欲而不逾距。用著者的话说：“消极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决不能把自由与散漫混为一谈，因为散漫的人不自由，他不能随时集结；也不能与放纵混为一谈，因为放纵的人也不自由，他不能随时收敛；只会打游击战的人，只会打阵地战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一个拘泥的道学家，一个沉湎于声色、货利、权位的人，也是同样的不自由。”放纵散漫在著者看来都不是自由。自由实际上就是运用自如，能收能放。

在积极方面，著者又提出：“自由就是中庸，就是通达。如果我们把不偏不倚的旧解释撇开，而把中庸的概念和经学的概念联系了看，甚至当作一回事看”。可是一提到中庸，大家总以为是折中，实际上是误解的。中庸便是恰到好处，就是不有过也无不及。

一个人立身处世，人我之维系，群己之共存，团体之间的分合，消极方面，要是不能随时收放；积极方面，要是做得不能恰到好处，也就是不得体。前者不是奴己就是奴人；后者不是损人就是损己，这怎能说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怎能说是自由？

无论是哪一种人，那一派，那一党，哪一种主义，如果不能满足生命的最大目的，不把人当人看，奴己也罢，奴人也罢，都不是自由，都不是通达自由之路。对于自由的解释，虽然有很多，无疑的，著者对于何者才算自由，何者不是自由，要算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目前宣传重于教育的时代，胡说，乱说，既不根据事实，又不根据理性，在我们的舆论界，显然是乌烟瘴气一团糟，要是自由两字本身能够说话，怎能长久受着曲解？我相信它一定要把“假汝之名”者的伪招牌揭穿，使假自由在太阳光下站不住脚，那么自由一词的真谛，也许要更加显得活泼、天真、可爱。要是教育是本，宣传是末，甚至宣传根本不是教育，这句话不错，读者也许会从《自由之路》一书里得到不惧宣传，不怕暗示的信心。这是达到自由之路的初步。

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①

一、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有平面的与上下的两种形式：农民进入工厂，变成劳工，或作家放下毛笔加入政界，可谓属于前者；佃农获得土地变成地主，或官僚失意下野变为平民，则是属于后者，这两种形式的人口活动，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是存在着的。

一个社会的解组过程中，职业间的人口流动，分外来得显著。目前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后方农民的流入工厂，旧手工业师徒的多数改业，都已成为抗战以来普遍的现象。

造成职业间的人口流动的原因，原有多种；但其中以工业化所引起的变迁，较为强烈。本文目的，即在就“平面的”流动，略加申论。

二、中国是所谓“五千年的农业古国”。当前她正遭到空前的灾难，空前的威胁，也是空前变局。中国的开始工业化，虽可追溯到同治年间，但以工业作为建国的基础，还是抗战以后的事。在战前，有时国内人士还发生“重农”或“重工”的争论，但到抗战以后，问题的中心已经由“重工”转变为如何“工业化”了。于是朝野上下都一致努力于工业的建设，在广大地方，如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前后建立了 15 个新工业区，在川滇黔三省中，战时新建立的工厂，依民国二十九年统计，资本以二十万元为最低额者：共计 472 家，西南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区域，若没有抗战，新工业在西南的发展，也许是近十年间所梦想不到的事。

抗战促成了中国由农业古国走向工业化的新国家，这一转变，要使旧的农业社会发生剧烈的解组。单是就传统职业方面而言，就已经带有急转直下的局面。

试先以英美工业先进国家为例：英国的工业化的情形，在 1905 年，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 33.3%；到 1911 年，只占 12%，农业人口降到几乎无

^① 原文发表在《当代评论》第一卷第 16 期，民国三十年 10 月 20 日出版。本论文为常姝女士手抄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足轻重的地步。美国也是如此：在 1890 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 64.6%，此后逐渐下降，至 1930 年仅剩 24.6%。可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促使大量的农业人口从事百业。

据我们在昆明市调查职业组织的结果，发现“改行”者甚多。例如：在四、五年前，裱书业本市共有三四十家，现在则只剩六七家了。其中还有一二家据说最近就要歇业，另谋出路。战前从事扎纸业的，约有二十余家，现在则只剩三四家，还是朝不保夕。战前做香料的家数：约在四十（家）以上；而现在还在继续营业的，不过十余家而已。小工业的“手艺人”也显然是不及从前多了。诸如此类的情形，正在方兴未艾，这是什么原因呢？据他们说“关门歇业”或“改行”，是由于“这行道不行时，加以警报多，生活又昂贵”。这些话，虽没有直接说出他们改行的理由，但这里实在已经包含了他们不得不“改行”的苦衷。

“警报多”确乎是战争的影响，战争不但破坏了很多“行道”，还使从前繁荣的店铺变成了“门可罗雀”。在昆明市，我们固然看见许多“店铺”被炸光了，这些被难的人们，有的不得不另谋“高就”，有的则只好“关门歇业”。还有些行业，虽未被炸，亦受到同样的打击。裱书业便是一例，原来论书赏书，那是和平时代的玩意，值此“兵马倥偬，军书廖午”之际，谁还能有此闲情逸致？类似的这些“行业”恐怕只有“关门”或“改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着。

昆明市许多行业的手艺人的改行，战争固是一因，最主要的还是后方工业化的影响。譬如小木业的师徒，很多往附近的工厂去了。他们所谓“行道不行时”一说，最能说出他们的衷曲；这“不行时”三字，最有分析的价值。

在工业的过程中，有些“行道”，当然敌不住新兴的事业，因而势必失去其固有的地位。一部产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旧事业悲兴交替的历史。有新事业的发展，即有旧事业的没落。这是生产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无须多说。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目前，在昆明市，有许多传统的“行业”，都在渐渐地动摇，没落，关门，以至于另谋出路。这是工业化必然结果，无足深怪。

所以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



三、在工业建设当中，新事业的急速增加，是需要大量劳力的。这些工人有的来自农村，有的则来自市镇中的旧职业，已如前述。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新事业能够从传统职业里吸收多少人口？换言之，亦即是传统职业能供给新事业多少人口？这是在职业人口流动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事业能够吸收传统职业多少人呢？这里没有可靠的数字可资征引。不过，新工业的吸收力量，可自其对传统职业组织的破坏的程度上，得到一个说明。其理由如下：

倘如新事业冲破旧职业的程度甚大，则传统职业里的手艺人，便失去谋生的机会，于是不得不从旧职业跳出，流向新兴的工业。反之，若是工业化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很小，则传统职业仍然还有拉住大量人口的力量，再加上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与不愿轻易抛弃“祖传”行业的心，那么，从农业到工业间的人口流动，也许要延长期限了。

新工业的发展，与旧事业的破坏，具有密切的关系。新工业如不能相当的破坏传统的职业，必将感受劳力的缺乏。因为这时新旧事业，都在需要人力。结果必造成新旧事业互相“挖人”的现象，旧事业亦不安全，新事业亦不稳固。所以“冲破”二字是新工业发展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正处在新旧事业交替的途中，其情形如何呢？就农村说，“农民离地”是战前熟悉的名词，而且被一般人认为是农村破产的象征，这名词在目前应是值得庆贺的。但是事实上，除去大批壮丁被征发从事抗战的神圣任务外，“农民离地”却是并不踊跃。

在西南各工业中，虽然容纳了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试分析这些农民离地的根本原因，很多还不是由于新工业吸引所致。据费孝通先生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一文中所述，女工入厂的原因，可以说近 80% 是由于家庭内的不和等。这些人虽然进入新兴事业，但工厂实在无法拉住他们。由此可见中国新工业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受到当时社会的限制。

新市镇中传统行业方面说，在昆明市，改行虽然很多，但是，改行的手艺人只有少数流入工厂，大多数流到其他传统职业（如人力车业、商店）里面去，后一种流动，对工业化可谓毫无帮助。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若不能及早加以修正，将来会对于新工业的建设发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推求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很多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恐怕是由于目前后方所建设的工业，并非如十八九世纪英国初建的工业那样的循序渐进，却与俄国彼得大帝提倡工业时有些相似，是一种对等跃进的局面。帝俄还在平时，中国则在战时，所以许多问题也就由此发生了。